

从“猛虎肆虐”到“虎迹少敛”： 甘肃地区虎的生态变动

——基于明清地方志为中心的研究

吴晓非

提 要：历史上，虎是甘肃地区主要野生动物之一。明清时期甘肃地区虎的分布范围较为广泛，且呈现出东多西少、南多北少的空间地理格局。清乾隆时期是甘肃地区虎的生存状态峰值期，数量较为丰富，分布范围覆盖全省，此后虎迹逐渐消退，部分州县几乎绝迹。森林覆盖率日益降低，人口急剧增长导致大量土地荒地被开垦，虎自身的利用和贸易价值，以及频繁的战事影响是导致清代乾隆以后虎的数量迅速减少、分布范围不断萎缩的主要原因。明清时期甘肃地区虎的分布变动呈现出一个从“猛虎肆虐”到“虎迹少敛”的轨迹，这是环境变动与社会变迁共同影响下的产物。

关键词：明清 甘肃地区 虎 变动

甘肃省位于中国西北地区，地势从西南向东北倾斜，地形狭长，呈现出高原、山地、平川、戈壁、河谷、沙漠交错分布的复杂地貌。由于地处内陆，远离海洋，受季风影响较弱，加上地貌复杂多样，甘肃境内各地降水量差异明显，呈现出从东南向西北递减的态势。虎作为亚洲特有的物种之一，位于食物链的顶端，在我国很多地区皆有分布，如东北、华南、新疆等地区。而在历史时期，甘肃境内虎的分布较广，其分布地域与自然生态的差异紧密相关。

目前学术界对我国历史时期虎的分布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新疆、山西、福建、陕西、四川等地^①，对于甘肃地区的研究极为少见，有则仅是寥寥数语，略有涉及，缺乏对甘肃地区历史时期虎的地理分布、变迁等长时段、全方位的综合探讨。本文通过对明清甘肃地区史志资料的爬梳整理，系统探讨明清甘肃地区虎的地理分布总体格局，并分析其变迁原因。^②

一 明以前甘肃地区虎的分布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白虎与青龙、玄武、朱雀并为“四象”，是代表西方的灵兽，在某种程

^① 参见蓝勇：《清初四川虎患与环境复原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3期；曹志红：《福建地区人虎关系演变及社会应对》，《南开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曹志红、王晓霞：《明清陕南移民开发状态下的人虎冲突》，《史林》2008年第5期；吴朋飞、周亚：《明清时期山西虎的地理分布及相关问题》，《井冈山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曹志红：《老虎与人：中国虎地理分布和历史变迁的人文影响因素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② 某一地区无虎的记载，不能代表这一地区无虎，可能有3种情况：一是这一地区有虎，但是没有发生人虎冲突，所以没有记载；二是这一地区有虎，也发生了人虎冲突，但是没有记录到地方志中；三是这一地区无虎。无论何种情况，还需要查阅更多的史志、资料，以得到更加完整的地理分布状况。

度上反映了西北地区是虎的最早起源地和广泛分布区。甘肃虎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距今10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公元2000年,在临夏东乡族自治县那勒寺乡东担村发现早更新世的虎的头骨化石。之后在庆阳华池县、西峰区和兰州榆中县都出现了晚更新世时期虎活动的痕迹。^①说明早在史前时期,甘肃地区就已经有虎分布。甘肃地区有文字记载的虎最早出现在汉代。据葛洪《西京杂记》载:“李广与兄弟共猎于冥山之北,见卧虎焉,射之,一矢即毙,断其髑髅以为枕。”^②李广射虎之“冥山”不知为何地,然李广与兄共猎,说明这是李广未从军前居家时所为。李广是陇西成纪人(今天水秦安县),故此冥山应在今天水地区。晋武帝泰始二年(266),有“白虎见天水西”;后赵石勒时,秦州曾进贡“白虎、白鹿”^③。唐玄宗天宝年间,陇右一带战乱频发,十室九空,出现“空村虎豹争”^④的现象。唐代宗大历十三年(778),陇右节度使朱泚“于兵家得猫虎同乳,以献”^⑤。宋太宗太平兴国初年,知秦段思恭“妄以供奉为名,贱市猓毛、虎皮”^⑥。自汉至宋,天水地区多次出现虎迹,充分反映了天水地区是甘肃地区虎分布的主要地区。

明代以前甘肃地区除天水虎迹较多外,陇南所在的秦岭山区也多有虎的出现。据嘉靖《徽郡志》载,唐玄宗天宝年间,杜甫从关中入蜀,途经成、徽两县交接处的木皮岭,有“再闻虎豹斗,屡踟风水昏”^⑦的诗句;在成县的石龛又有“熊罴咆我东,虎豹号我西”^⑧的诗句。宋神宗熙宁年间,栗亭县“虎为民患”,新任栗亭尉宋保设法除之。^⑨元成宗贞宁年间,阶州(今武都县)西70里的武都山“有虎,(法)冲诣告曰:今穷谷相投,可见容否?虎皆遁去”^⑩。表明在唐、宋、元时期,甘肃陇南地区一带虎的分布较多。此外,平凉静宁县在明代以前也有关于虎的记载。^⑪

由此可见,明代以前甘肃地区的虎分布较为集中,主要分布在陇东、陇南、陇中等黄河以南地区,基本奠定了明清甘肃地区虎的分布的地理格局。从历史记载来看,虎的出现多为人虎冲突,物产类的记载较少,可见这一时期甘肃地区虎的数量较为丰富。

二 “猛虎肆虐”:明至清乾隆以前甘肃地区虎的分布

进入明代以来,中央王朝加大对西北地区的经略,甘肃地区迎来了历史上经济开发的

① 参见颉光谱、张行:《甘肃榆中晚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古脊椎动物学报》1994年第4期;邱占祥等:《甘肃东乡龙担早更新世哺乳动物群》,科学出版社,2004年;谢俊义、许俊臣:《甘肃华池马兰黄土中的哺乳动物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学报》1988年第2期;胡长康:《甘肃第三纪后期及第四纪哺乳类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2年第1期。

② 葛洪:《西京杂记》卷5《金石感偏》,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38页。

③ 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卷6《风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563号,第541页。

④ 杜甫著,张式铭标点:《杜工部集》卷10《奉送郭中丞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使三十韵》,岳麓书社,1987年,第159页。

⑤ 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卷6《风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563号,第547页。

⑥ 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卷6《风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563号,第369页。

⑦ 嘉靖《徽郡志》卷8《艺文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329号,第216页。

⑧ 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卷11《艺文》,“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563号,第1580页。

⑨ 参见嘉靖《徽郡志》卷5《秩官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329号,第81页。

⑩ 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卷12《杂记》,“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563号,第1922页。

⑪ 参见乾隆《静宁州志》卷7《艺文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333号,第363页。

热潮，加之外来经济物种引进并迅速推广，甘肃地区的人地关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人虎关系也变得格外尖锐。另外，明代之后，地方官编纂地方志的风潮逐渐兴起，虎患、人虎冲突也随之更多出现在文本的记载中，能够直观地还原一场特定区域内人与虎共同演绎的历史剧本。

笔者统计明清时期甘肃地区各史志资料中关于虎的记载，如下表所示：

表1 明清甘肃虎分布一览

朝代	府、州、县	共计
明	狄道、河州、庆阳、合水、静宁、庄浪、清水、徽县、文县、成县、崇信、古浪	12
清乾隆以前	狄道、河州、渭源、正宁、合水、陇西、岷县、宁远、伏羌、西和、会宁、静宁、庄浪、华亭、秦州、清水、徽县、两当、成县、镇原、甘州、礼县、高台、环县、康县、金县、镇番、平番、武威、安定	30
清乾隆之后	河州、靖远、岷县、临潭、华亭、秦州、徽县、文县、敦煌、会宁	10

由表1可知，明代甘肃地区的虎主要集中于甘肃东南部，清代出现虎患记载的频率增多，到乾隆时期达到峰值，虎的分布范围发展到全省。

明代甘肃地区虎的分布较为集中且数量较多，主要在陇东南、陇中的山林、山麓地带。明朝前期，庆阳府森林密布，“合抱参天之木，林麓连亘于五百里之外”，虎等野生动物“得以接迹于山藪”，500里范围内皆为虎的出没范围^①，可见丰富的森林资源使得虎得以生存。据嘉靖《徽县志》记载，嘉靖四十三年（1564）徽县一日夜间发生地震，百姓惨不堪言，是年冬“获三虎”，可见地震的破坏导致虎的栖息地受损；乡民一次性捕获3只虎，亦说明虎的数量较多。^②清水县邑人李延康在穿越县境内陇山的途中作《度陇山》一诗，其中“白昼林间虎豹穿”^③，描述虎豹于白昼在林间自由出没觅食的情景，可见清水县境内陇山一带虎豹生存环境良好，虎豹成群结队，繁衍生息。明世宗二十六年（1547），山丹卫儒学训导石韞璧，遭庶母丧，于西山下园内停柩三载，孤身庐守，“猛虎时夜入”^④。为母守丧3年间，猛虎数次入园中，足见当时虎迹频现，虎的数量可观。明代后期，文县生员郭万春遭遇虎害，“于南山桥头，为虎衔去”，其妻米氏“追夺其夫，以石击虎，虎怒，舍其夫而食其邑人”^⑤。米氏虎口夺夫成一番佳话，然亦可知当时文县南山一带虎患猖獗，肆意伤害邑人，人虎冲突

① 参见嘉靖《庆阳府志》卷3，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刻增修本，藏于甘肃省图书馆，第20页。

② 参见嘉靖《徽郡志》卷8《艺文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329号，第246页。

③ 康熙《清水县志》卷12《艺文纪》，“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第33册，江苏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65页。

④ 民国《甘宁青史略》，“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21卷，兰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55页。

⑤ 乾隆《甘肃通志》卷43《烈女二》，江苏古籍刻印社，1989年，第77页。

格外激烈。明崇祯十年（1637），成县人钟其硕在前往县境五朵峰求雨的途中，目睹山中“虎豹往还于藪”^①。虎豹往返于草木之中，可见人与虎相遇概率很大，这与虎豹的数量是直接成正比关系的，说明当时文县虎的数量多。崇祯年间，流寇陷合水县城，崇祯四年至七年，“流寇杀戮甚众”，“民死无数”，“杀戮之惨更甚”，导致“人民星散，止余空城，劫余黎庶窜山谷间，荆棘满目，虎狼为患，前后二十年”^②。合水县百姓流落于山谷之间，前后20余年受尽虎患、狼患的茶毒，可见明末时期合水县境内虎的数量之多，持续时间之长，虎患危害之严重。

上述只是对于明代甘肃地区的虎与虎患勾稽一二，可以看出，明代陇东、陇南、陇中皆有虎和虎患的分布，这在以往前人的研究成果中并没有被提及。而且，明代虎患呈现愈发频繁态势，程度愈显激烈，一方面由于文献记载日益丰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甘肃地区人地关系日益紧张、土地利用方式转变导致生态环境恶化，这无疑是明代虎患加剧的根本原因。

入清以后，史志记载更为丰富，虎患记载愈发增多，人虎冲突也愈演愈烈。成县位于陇南的秦岭山区，境内多虎患。早在明崇祯年间，有邑人目睹虎豹往返于山藪之间。清朝初年，宋琬路过成县，因老虎常藏身于林间洞穴，行人只得绕路而行，而写下“虎傍禅林穴，人从木杪行”的诗句。乾隆三年（1738），黄泳任成县知县，时虎患严重，在任期间多次为民祛除虎害。据记载，成县北黑峪河有一条至县的捷径，荒废倾圮，“往往密菁茂草中时伏猛虎，肆害行人，虎肆其虐，往往群聚，白日啣人，为地方害”。知县黄泳为民驱虎，向城隍祭文祷告，请求神灵驱逐、捕杀猛虎，作《虎禳》一文，其文曰：

虎之威，能役鬼以为侏，侏之痴转导虎以伤人，其愚已取笑昔人矣。申酉两岁，虎肆虐于成境。彪者，虬者，白昼群行，鼓唇砺爪，觅人是啣。行人以绝，力作以粟，为虎伤者百十其列。泳闻而哀之，遂乃为文祷城隍祈阴戢其暴，而虎迹少敛。又悯侏鬼之愚而受役也，设斋醮，假超援以去所凭。其有冥顽者，则于利州募善射者，操穹弓毒矢从事，杀十数虎而患息。是役也，余虽难不能德比异类，有负子渡河之异，然为民除害，守土职也。若夫告神驱侏之举，迹虽近诞，犹是圣人神道设教意也。^③

这是甘肃地区较早的一篇驱虎文。黄泳在驱虎文中清楚地说明了虎患的严重程度，称“为虎伤者百十其列”，最终以“杀十数虎”以平息虎患，足见乾隆时期成县境内虎的数量众多，虎患严重。

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渭源县乡民任四狗，世代为农，只因“父死于虎”，便习鸟枪，“誓杀百虎，以报复仇”，最后，任四狗从少至老“计所杀以九十余虎”来告慰其父在天之灵。面对虎患，渭源县乡民积极应对，任四狗带动乡民捕杀老虎，“久而成业，秦陇猎人争师之”，出现了专门捕虎的职业。“九十余虎”，也显示渭源县是甘肃地区记载虎的数量最多的地区。^④

乾隆年间，狄道县境内常有“当路立猛虎”事件发生，而且虎骨一度成为当地的土特产。

① 乾隆《成县新志》卷4《艺文·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332号，第515页。

② 民国《甘宁青史略》，“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21卷，第499页。

③ 乾隆《成县新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332号，第272、329页。

④ 参见民国《渭源县志》卷8《人物志·孝子》，“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326号，第273—274页。

清代中前期，华亭县也是人虎冲突频发的地区。顺治十五年（1658），“金山卫有白虎突入城，负一姬去，守陴官兵格斗，复啣死四人”；而后康熙二年（1663），“有虎从西来”，伤两名邑人，官府“遣兵四出捕之，不获”^①。5年之间，发生两起虎患，且伤人性命，甚至官府派官兵捕杀，亦未有所获，可见虎灾之烈，虎患严重之程度，而且持续时间长，直至乾隆年间，仍有乡民“遭虎害”。^②

乾隆年间两当县虎的数量亦很多。两当县知县秦武域在任期间，因境内遭遇虎患，作《遇虎仿陆浑山火体用其韵》，其中写道，县境“万山屯盘，纤萋郁纷”，野生动物种类繁多，“独有雕虎猛且繁”，甚至在县境内“肆无忌惮，白昼攫人”^③，说明此时虎患严重。

地处子午岭山区的合水县，在清代时，虎的数量也较多。在县境内东山附近，人迹所不能到之处，“虎狼依栖”。之后随着经济开发，县民大量捕杀老虎，“以山中所出如虎狼之皮”，获之而“资于世用”^④。乾隆《秦州直隶新志》中记载，当时秦州的野生动物数量较多，称“秦州野多虎、狼”^⑤。

此外，清代诸多方志“物产”条目中有较多关于虎的记载。“物产者产于地而因于时者也。地有肥瘠，则产有丰啬；时有寒燠，则成有蚤暮。”^⑥物产多为依据本地自然条件所产，且数量较为丰富。笔者根据所查到资料，将乾隆之前甘肃各州县方志“物产”中有虎记载的基本史实进行归纳，列举如表2：

表2 清乾隆前甘肃方志《物产》中有虎记载的州县一览表

州、县	记载的大型动物	出处	朝代
河州	兽类：虎、土豹、豺、狼	《河州志》卷4《土产》	乾隆
正宁县	兽属：虎、豹、狼、狐	《正宁县志》卷4《地理·物产》	乾隆
陇西县	毛属：虎、豹、鹿、狼	《陇西县志》卷2《物产志》	乾隆
岷州	毛族：彪、豹、虎、熊	《岷州志》卷2《物产》	康熙
宁远县	兽类：豺、狼、虎、豹	《宁远县志》卷1《舆地·物产》	康熙
伏羌县	兽属：狼、虎、獾、豺	《伏羌县志》卷5《物产》	乾隆
西和县	兽类：熊、狼、虎、豹	《西和县志》卷2《物产》	乾隆
静宁州	毛属：熊、虎、鹿、獐	《静宁州志》卷3《物产》	乾隆

① 光绪《重修华亭县志》卷23《杂志上》，清光绪四年刊本，甘肃省图书馆藏。

② 参见民国《增修华亭县志》第9编《人物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554号，第456、478页。

③ 道光《两当县志》卷12《艺文·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342号，第237页。

④ 乾隆《合水县志》下卷《物产》，“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345号，第209、210页。

⑤ 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卷4《食货》，“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569号，第318页。

⑥ 杨恩纂修，纪元补辑：《巩昌府志》卷8《物产》，“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第2册，第306页。

(续表)

州、县	记载的大型动物	出处	朝代
秦州	野多虎、狼、猴、狨	《直隶秦州新志》卷4《物产》	乾隆
礼县	畜兽：野猪、虎、豹、狼	《礼县志》卷16《物产》	乾隆
徽县	兽类，兔、熊、虎、猴	《徽县志·物产》	乾隆
阶州	鸟兽，虎、豹、狼、豺	《直隶阶州志》下卷《物产》	乾隆

从表2可以明显看出，清前期，甘肃多个地区的方志《物产》篇中记载有虎，尽管部分地方志延续了前代记录，我们仍可断定清乾隆以前这些地区有虎的分布，且可以认为受人类活动的影响，虎的生存轨迹逐渐进入人的视野范围内，且产生人虎冲突，而后被方志撰写者纳入《物产》篇，从各地《物产》中的虎皮、虎胫骨等虎产品中也可可见一斑。

通过对清代乾隆以前甘肃地区虎、虎患记载的整理和分析可以看出，从明代至清乾隆年间，虎的分布范围由陇东、陇南和陇中逐渐扩大至涵盖河西走廊地区在内的整个甘肃地区；虎的数量愈发增多，多者达到“十数虎”“百虎”，且诸多州县都将虎作为当地的野生物产；另外，乾隆时期虎患发生愈加频繁，以致“白昼攫人”，更能说明这一时期人虎矛盾之激烈。总之，无论虎的分布范围，还是虎的数量，亦或是虎患的严重程度，都在清乾隆年间到达峰值。

图1可以直观地展示出这一时期分布范围扩大到顶峰，当然，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方志资料愈发丰富和详细，但是更为根本的原因是伴随着人类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地大规模开发，人地关系的矛盾愈发尖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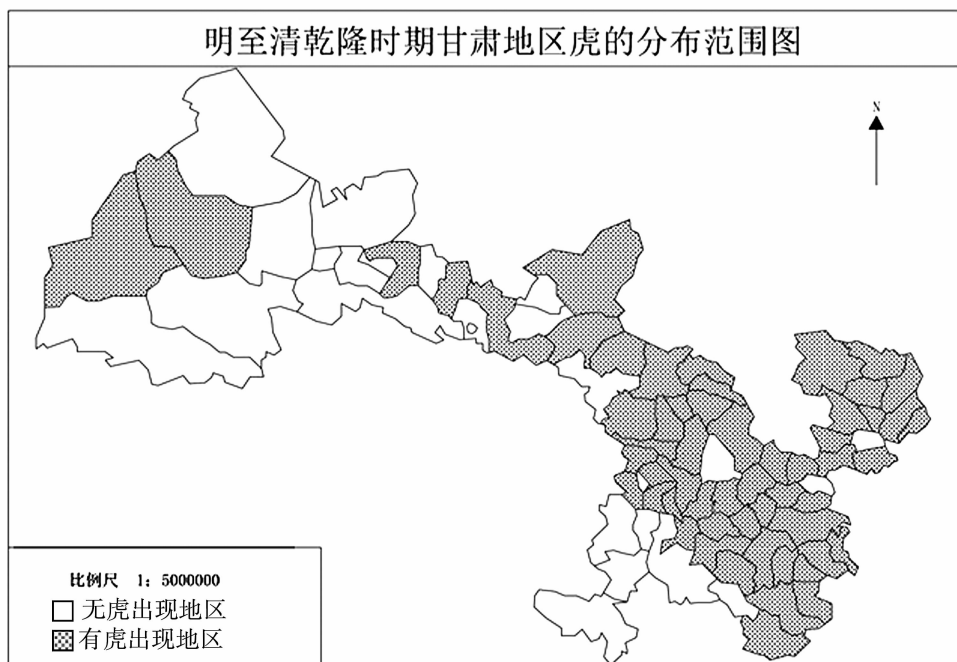


图1 明至清乾隆时期甘肃地区虎的分布范围图

三 “虎迹少敛”：清乾隆以后甘肃地区虎的分布

虎的分布范围在清代乾隆年间覆盖至整个甘肃地区，且虎的数量较为丰富。到了清乾隆之后，尽管在史志资料上愈加丰富，涵盖方面、地理范围愈发扩大，但是与虎相关的记录反而越来越少，虎患发生的频率亦越来越低，虎的栖息地不断萎缩，很多州县再无虎的记载，甚至虎已不断消亡，面临绝迹。

屈吴山，在会宁县东北300里，据《甘肃省志》记载，此地“南接六盘山，峰峦耸峙，林木森茂，甘泉回流”，自然环境非常适合虎的生存。“昔时有獐、鹿、虎、豹等野兽”证明过去有虎的分布，然而“今林木伐尽，野兽亦远遁矣”^①。可见至清末民初，山上林木砍伐殆尽，虎等野生动物被迫迁移或逐渐消亡，数量大大减少。华亭县境内的虎的数量也远不如前。前文提到，顺治年间，华亭境内人虎冲突激烈，虎患严重，虎入城中伤人，派遣官兵捕杀，反被虎伤。然而到清代后期，据嘉庆《华亭县志·物产》记载，华亭县境内的虎、豹、熊等大型野兽“今少于昔”，说明虎的数量在逐渐减少。更甚者，民国时期编纂的《增修华亭县志》中的《物产》篇中已再无虎的记载。^② 明末清初，合水县虎的数量较多，虎皮成为重要的货物商品，“资于世用”，然而，乡民大量捕杀老虎以取虎皮，导致后来“虎皮难得”。一方面由于对虎的猎杀十分困难，最主要的原因是虎的数量已经急剧减少，虎已变得稀有。^③ 河西走廊地区的镇番县亦是如此，民国时期虎已消亡殆尽。康熙年间，镇番县境内“有虎豹之属”，而且虎患严重，有猎人上报，县北山有虎伤一蒙古族妇人，后被官兵捕杀。然而，民国时期，“今境内无虎，常见者，狼獾而已”^④，可见该地虎的数量急剧减少，已然绝迹。乾隆年间虎尚为礼县境内的畜兽物产，然而光绪年间《重纂礼县志》中再未出现，说明到了光绪朝，礼县境内虎已绝迹。^⑤ 由上文表2可知，康熙乾隆年间，甘肃地区有十几个州县的物产中记录有虎，但是在清朝末年编纂的《甘肃新通志》的《物产》篇中仅记录为“毛类：虎，通省不概见”^⑥。而且，到清代后期、民国时期，许多州县编纂的县志中，《物产》篇中已然没有虎的踪迹。可见，至清末虎的分布范围已十分狭小，数量已变得十分稀少。另外，清代前期诸多州县盛产虎皮，并将其作为主要物产，《新修庆阳府志》记载，乾隆年间境内毛类物产有“虎皮、狐皮、鹿皮”^⑦，然而，到民国时期，虎皮的产地则仅“产于渭川、西宁两道属境”，说明仅仅渭川、西宁两道有虎的分布，而且“产额不定”^⑧，数量十分有限。最近一次记载出现在1953年10月，会宁县村民熏死一只过境的野生虎，标志着甘肃省野生虎的终结。^⑨

清乾隆时期是虎的数量以及分布范围的临界点，之后急转直下，数量不断减少，分布范围不断萎缩。通过对乾隆时期以后关于虎、虎患记录的分析整理，笔者认为清代后期甘肃地区虎的数

① 民国《甘肃省志》第3章《各县邑之概说·兰山道·会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33卷，第35页。

② 参见嘉庆《华亭县志》卷4《田赋志·物产》，“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第32册，第271页。

③ 参见乾隆《合水县志》下卷《物产》，“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345号，第209页。

④ 谢树森纂，谢广恩、李玉寿整理校订：《镇番遗事历鉴》，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第230、242页。

⑤ 参见光绪《重纂礼县志》卷2《物产》，“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第22册。

⑥ 宣统《甘肃新通志》卷12《舆地志·物产》，“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23卷，第615页。

⑦ 乾隆《新修庆阳府志》卷3《物产》，“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第22册，第276页。

⑧ 民国《甘肃省志》第6章《实业·农业》，“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33卷，第169页。

⑨ 参见邓明：《陇上野生虎的终结》，《档案》2011年第1期。

量已十分稀少，民国时期甚至部分州县已然绝迹，虎已不再是甘肃地区自然条件下所固有的物产。

由图2可以看出清乾隆之后甘肃地区虎的分布范围急剧萎缩，仅仅有几个州县尚有虎的踪迹。在清朝后期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向山地进军高潮迭起的大背景下，甘肃地区虎灭绝的结局是注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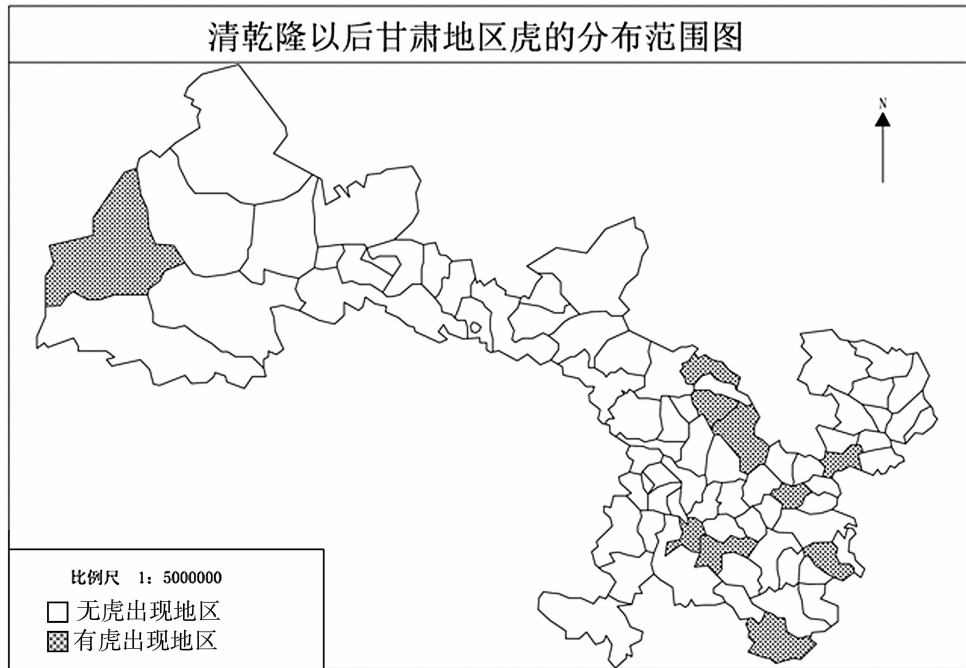


图2 清乾隆以后甘肃地区虎的分布范围图

四 虎分布范围变动的原因

从乾隆时期之前的“猛虎肆虐”，再到乾隆时期之后的“虎迹少敛”，清晰地勾勒出明清时期甘肃地区虎的分布变动轨迹，即明代虎的分布较为集中于甘肃的东南部，且记载多为物产所属，虎患较少；清代出现虎患记载的频率增多，到乾隆时期达到峰值，虎的数量较为丰富，虎的分布范围发展到全省，人虎冲突十分激烈；清朝后期，诸多州县虎已绝迹，再无虎的记载。关于虎的生存环境，有研究者表明：必须具备足够的动物资源，供它们猎食；必须具备足够的水源，供它们热时洗浴和饱食之后痛饮；必须有足够的林木或丰草，供它们隐藏。尤其是对草木的要求非常高。^①可见，虎对生存环境的要求较为苛刻，一旦发生变动，便很难适应，难以生存。清乾隆之前甘肃地区虎的数量较多，分布范围广泛，为何之后濒临绝迹？

首先，森林覆盖率日益降低，虎的栖息地逐渐萎缩。虎的生存是以森林中的各种动物为食的，虎与森林的关系非常简单，没有森林就没有老虎。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因森林中大型动物的

^① 参见谭邦杰：《虎》，科学普及出版社，1979年，第15页。

数量不同，一只成年老虎通常需要20—100平方公里的森林作为栖息地。^①道光年间《会宁县志》记载了屈吴山种过去有獐鹿虎豹，“今林木伐尽，野兽遁迹”^②，可见山中林木砍伐殆尽，虎等野兽失去了生存领地。在甘肃的武都故道、贺兰山等虎的分布区，森林遭到大规模的砍伐。该地区山泽“为草木之所蔽，林木不可胜用矣，而此草木者又多为禽兽之所依聚”，说明林木是虎的野兽的主要栖息地，而“今则砍伐殆尽”^③，则虎无所依聚，只得逃亡他处或者逐渐消亡。陇南文县多山地丘陵，山林面积分布广阔，然康熙年间被大规模无节制的砍伐，“皆为竭泽而渔者告去，文之花木犹是”，以致“由崇禎迄今七八十年间产木之地有若上丹堡，若铁炉寨，采取殆尽，自康熙十一年以至二十五年，山林告兀”^④。不足百年，便采取殆尽，山林告兀，如此这般，森林资源必然锐减。另据乾隆年间《五凉全志》记载：“镇邑左右临边不过二三十里，口内并无山场树木及产煤处所，自开设地方以来，各县官民人等日用柴薪樵采于东西北之边外，以供终年炊爨、实业。他地不同，请以边外一二百里之外樵采，以资民生。”^⑤乾隆年间，镇番县官民日用柴薪来源即为砍伐“一二百里”之外的林木资源，可见森林资源的日益减少，导致虎的栖息地不断萎缩，甚至造成有些州县虎的绝迹。

其次，清朝后期甘肃地区战事频繁，使虎的生存环境受到一定影响。庄浪在历史上一直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接触的前沿，在军事上是必争的战略要地，明代为防止西北游牧民族入侵，常采取放火烧山的策略，将远近山林付之一炬，使其无处可待，期可不攻自退。这种做法最大的后果是草木俱焚，森林植被受到彻底的破坏。明成化四年（1468）满俊之乱后，甘肃总兵定西侯蒋苑曾上奏，“平凉以西，赤地千里”，诗人墨客形容当时是“荒山无草木，深涧尽冰霜”，反映战乱对植被的破坏情况。^⑥清末民初，甘肃地区战事频繁，天水地区流传着一首《天水战事歌》，其词曰：“今森戈矛猛，驱虎豹，屯貔貅，彼军盈万，鸟兽散。”受战乱影响，不仅百姓惨罹难，虎豹鸟兽的生存境地也受到很大威胁。^⑦另据《永登县志》记述，雍正年间一场汉民与番民的冲突，亦可加以印证。“棹子山，城西三百里，两山相连，崎岖险峻，密松四围，为番民巢穴。雍正元年，番民梗化，遂据此山。凉庄道蒋洞练民兵，暨监屯厅王廷松随同大将军岳钟琪率七营兵用大斧砍伐树木，直抵其穴，番夷始平。”棹子山，在城西，“虎，近来西山多有，常伤人畜”，说明崎岖险峻，密松四围的山地不仅仅为番民巢穴，也是虎的生存栖息地。官府派遣7个营的兵力来大肆砍伐树木，平定番夷的同时，亦将虎的巢穴破坏殆尽。^⑧

再次，人口急剧增长，耕地面积扩大，土地的开垦不仅毁灭了虎的栖息地，将其推向灭亡的边缘，也对其他野生动物种造成巨大的打击。明代，在西北边疆地区大兴屯田，军屯、民屯遍于天下，甘肃必不例外。明初大将徐达征伐西北，出萧关，连克平凉、泾州等地，开始在泾州屯田，诏令“天下卫所军，以十分之七屯田”，以屯养军，以军隶民。为此在“泾设军

① 参见[美]马立博著，王玉茹、关永强译：《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

② 道光《会宁县志》卷2《輿地志·物产》，“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第8册，第54页。

③ 民国《甘宁青史略》，“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21卷，第58页。

④ 康熙《文县志》卷8《艺文》，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刻本，第78页。

⑤ 乾隆《五凉全志·镇番县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560号，第322页。

⑥ 参见庄浪县水土保持志编纂领导小组编：《庄浪县水土保持志》，1998年，第39—41页，藏平凉市图书馆。

⑦ 参见民国《甘宁青史略》，“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21卷，第268页。

⑧ 参见民国《永登县志》卷1《地理志·山川》，“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第21册，第434页。

队卫屯田 12.9 万亩”（约合 0.86 万公顷）。^① 以致于在明代泾川一带，“昔昆夷之地，古者省山启辟，惟患其木多，今翟翟童矣”，山林受到严重破坏。^② 道光《重修镇番县志》中记载：“我朝轻徭薄赋，休养生息一百八十余年之久，户口较昔已增十倍，土田仅增二倍而已。二倍之田养十倍之民，而穷输将踊跃母事追乎我。”^③ 清初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人地关系矛盾凸显，迫于生计，人们只能向山地、高地开发。据光绪《镇番县乡土志》记载：“本境自改县而后，幸逢承平之休，户口之盛，蒸蒸日上。是故乾隆三十年仅八千一百九十一户，道光初即一万六千七百五十六户。”^④ 仅仅 30 多年的时间，户口增长两倍之多，必然会给人地关系造成极大的紧张。

最后，虎自身的利用和贸易价值，能够产生高昂的经济价值，以致招来大量的捕杀。虎骨、虎掌可作为药材使用，且价格比较昂贵。顺治《华亭县志》卷 3《赋役·物产》记载，“药，虎胫骨、虎掌，刺患舒药也”^⑤；嘉庆《华亭县志》卷 4《田赋·物产》同样记录了“药，贵者，鹿茸、虎骨、麝香……虎掌，刺桩药”^⑥，表明虎骨、虎胫骨、虎掌具有很好药效。据乾隆《直隶阶州志·物产》卷记载：“药品：麝香、熊胆、虎骨……”^⑦ 可见该地虎遭到大量诱杀。康熙《庄浪县志》，也记载了“虎胫骨”作为一种药类的物产。^⑧ 虎皮实用价值极高。梳理地方志材料，得出一些对虎皮利用的资料，如表 3 所示：

表 3 明清时期甘肃虎皮利用一览

府、县	文献记载	出处
镇番县	……近又有虎皮……	《镇番县志》
巩昌府	虎豹狐貉之皮，花屏砚材之玩，梗楠杞梓之器……	《巩昌府志》
正宁县	货属：虎皮、狼皮、狐皮……	《正宁县志》
庆阳府	皮类……虎皮、狐皮、鹿皮……	《新修庆阳府志》
合水县	虎皮，难得	《合水县志》

从上表可以看出，明清时期虎皮的市场需求量较大，然而“虎皮，难得”，一方面是由于虎作为巨型猛兽，难以捕杀，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虎的数量在不断减少。时人为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千方百计地捕杀老虎，加剧了虎的生存危机。

① 参见《泾川县志·农业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 年。

② 参见《甘肃森林》，甘肃省林业厅内部印行，1998 年。

③ 道光《重修镇番县志》卷 3《田赋考·物产》，“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第 43 册。

④ 光绪《镇番县乡土志》卷 6《户口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第 43 册，第 376 页。

⑤ 顺治《华亭县志》卷 3《赋役·物产》，“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第 35 册，第 193 页。

⑥ 嘉庆《华亭县志》卷 4《田赋·物产》，“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第 35 册，第 268 页。

⑦ 乾隆《直隶阶州志》卷下《物产》，“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第 9 册，第 498 页。

⑧ 参见康熙《庄浪县志》卷 3《财货志·物产》，“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第 18 册，第 61 页。

结 语

明清时期甘肃地区虎的分布变动呈现出一个从“猛虎肆虐”到“虎迹少敛”的过程。清代乾隆时期为甘肃地区虎的生存状态峰值期，数量较为丰富，分布范围覆盖到全省地区，乾隆之后虎迹逐渐消退，部分州县几乎绝迹。森林覆盖率日益降低，人口急剧增长导致大量土地荒地开垦，虎自身的利用和贸易价值，以及频繁的战事影响是导致清代乾隆以后虎的数量迅速减少，分布范围不断萎缩的主要原因。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一段虎的变迁史，既是虎与人的关系史，也是虎与自然的关系史，是一部老虎与人类活动和生态环境变迁的互动关系史。^①虎的生存繁衍既受自然生态环境内部诸要素的影响和制约，同时作为人类与动物系统中的一个因子，其必然与人类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在对老虎栖息地的变迁等变化进行全方位考察时，人类活动与自然的因素必须考虑进去，缺一不可。

从林中本无野兽，唯有被人类逼得野蛮的动物。^②虎作为一种大型肉食动物，处在生物链金字塔塔尖的位置，其分布和变迁很大程度上反映着所在区域的自然环境状况，是环境变迁研究常用的生态指标之一。^③虎的分布变迁，数量不断减少，栖息地不断萎缩，应从人类活动、自然生态环境、重大灾害等多方面综合考虑。从现实角度上来讲，对甘肃地区老虎种群的相关研究，希望我们能从历史教训中吸取经验，亡羊补牢，将中国虎从灭亡危机当中拯救出来，提醒当代人民应当总结教训，避免此等悲剧蔓延至其他动物种群。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本文责编：周 全

《镇江市史志研究论文集（第四辑）》出版发行

由镇江市史志办公室编辑的《镇江市史志研究论文集（第四辑）》于2020年4月出版发行。全书30余万字，分社科课题、党史研究、方志编修、年鉴编辑4个篇章，收录2015—2019年镇江市史志系统撰写的理论文章60多篇，展示了镇江史志理论研究成果。

（中国方志网）

① 参见钞晓鸿：《生态环境与明清社会经济》，黄山书社，2004年。

② 参见[美]苏茜·格林（Susie Green）著，乔云译：《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6—48页。

③ 参见吴朋飞、周亚：《明清时期山西虎的地理分布及相关问题》，《井冈山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